

# 杜預《長曆》與經傳曆日考證

鄧積意\*

南開大學中文系

## 摘 要

《長曆》是杜預據《春秋》經傳曆日而編排的曆譜。其特點是「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攷晦朔」，其目標是符合經傳曆日。與杜氏之前的諸曆譜相較，《長曆》失三十三曆日、四日食，可謂最合經傳曆日。不過，除失三十三曆日外，《長曆》還失七曆日，對此，杜氏皆以「從赴」釋之（所謂從赴，指他國以崩薨禍福來告，國史據以書之）。惟因杜氏「從赴」說前後矛盾，故杜氏關於失七曆日的解釋並不可信。由杜氏據從赴、依文意置閏可知，《長曆》的編排，不單與杜氏的曆日考證相關，且與杜氏對經傳的理解相關。經學與曆學的相互印證，將有助於全面理解杜預《左氏》學。

**關鍵詞：**杜預，《長曆》，《左傳集解》，曆日考證

## 一、小引

杜預《長曆》見於《春秋釋例》，是杜氏據《春秋》經傳曆日而編排的曆譜。《長曆》的特點，如杜氏自言，「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攷晦朔也」，<sup>（註1）</sup>知《長曆》編排以經傳曆日為準。由於經傳曆日有非曆理可解者，故《長曆》也不全依曆理。對此，杜氏有極清醒的自覺意識，其論曰：「《春秋》有頻月而食者，有曠歲而不

---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gaojiyi@nankai.edu.cn。

1. 杜預，《春秋釋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6冊），頁265下。以下《長曆》之文，皆見《釋例》，但出頁碼。

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歷無有不差失也」，並指斥學者「各據其學以非《春秋》」。(註<sup>2</sup>)準此，後世學者訾譏《長曆》違背曆理，雖合乎實情，卻不合杜氏的本意。(註<sup>3</sup>)就經學史的層面看，若須準確把握杜氏《左氏》學的特點，《長曆》如何與曆理不合，杜氏如何曲循經傳曆日以編排曆譜，必須仔細探究。否則，僅因《長曆》不合曆理而置之弗論，則與《長曆》相關的經學問題，有可能聞而不彰。可惜，此問題迄今未見詳細討論。精通曆學的學者，對《長曆》多所譏彈而不願詳論；尋常文史學者，又因學科隔閡疏於曆學，欲論而弗能；亦有兼精經學與曆學的學者，如清代陳厚耀等，論及《長曆》，又嫌零散不具系統。有鑒於此，本文一方面揭示《長曆》與曆理不合的概況，表彰杜氏如何依據經傳曆日而編排曆譜的過程，另方面結合杜氏經注中的相關問題，顯現曆日考證與杜氏經傳注釋的相關性。希望能為深入研討杜預《左氏》學，提供一種參照、一份助益。

## 二、《長曆》的頻大月設置

杜預之前，諸古曆（如古殷曆、顓頊曆、三統曆、乾象曆等）皆有上元、歲實、朔策、閏周等，據這些數值編排曆譜，頻大月與閏月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杜氏《長曆》既不依曆算，閏月與頻大月的位置也就不定。問題是，此種不定，是完全的隨意呢，還是有一定之法？

四分曆推求各月朔日之法，乃大餘加 29，滿 60，除去之；小餘加 499，滿 940，進 1。因此，只要有頻大月，就可推出此兩月的小餘區間。隱公元年，《長曆》十月丙午大，十一月丙子大，十二月丙午小，十月、十一月即為頻大月。若據四分術，則十月的小餘必在 882 至 939 之間，十一月的小餘必在 441 至 498 之間。今以隱公世為例，十月丙午朔的小餘分別假設為最小值 882、最大值 939，並比較《長曆》的頻大月設置，見下表：

2.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6 上。

3. 如清代江永《群經補義》云：「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歷，杜氏曲徇傳文。……歷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曆》，非知歷者也。」江永，《群經補義》，《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第 194 冊，頁 30 上。

表一：四分曆頻大月法與《長曆》之比較（隱公世）

《長曆》的頻大月編排	以小餘 882 衡之	以小餘 939 衡之
1. 隱元年十月丙午大、十一月丙子大	882、441，合	939、498，合
2. 隱二年閏十二月己巳大、隱三年正月己亥大	847、406，不合	904、463，合
3. 隱四年五月辛卯大、六月辛酉大	870、429，不合	927、486，合
4. 隱五年十二月壬子大、閏十二月壬午大	11、510，不合	68、567，不合
5. 隱六年十月丁丑大、十一月丁未大	800、359，不合	857、416，不合
6. 隱七年閏十二月庚子大、隱八年正月庚午大	765、324，不合	822、381，不合
7. 隱九年三月癸亥大、四月癸巳大	730、289，不合	787、346，不合
8. 隱十年五月丙戌大、六月丙辰大	695、254，不合	752、311，不合
9. 隱十一年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大	718、277，不合	775、334，不合

表中，隱元年十月丙午朔的小餘取值愈大，與《長曆》的頻大月設置愈合。可是，即使小餘取最大值 939，隱公世《長曆》頻大月共九，而合者惟三。顯然，《長曆》設頻大月，並非依小餘加 499 爲算，而是有所改動。那麼，杜氏究竟如何改動呢？《長曆》云：

至咸寧中，有善算者李修、夏顯，依曆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

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今其術具存。

時又並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疏也。（註 4）

據此，其一，杜氏應知曉古曆演算法，所謂「攷古今十曆以驗《春秋》」，其結果在《長曆》中已有體現，如《殷曆》得日食十三，失日食二十四；《泰始曆》得日食十九，失日食十八等。這些結果雖有「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攷《春秋》」（註 5）可以參照，但《泰始曆》、《乾度曆》的考證結果顯是杜氏自作。若不知諸曆之演

4.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6 上。

5. 同前注，頁 267 上。

算法，杜氏不可能得出這一準確結果。其二，審繹文意，《長曆》的編排似以《乾度曆》為基礎。據杜氏所言，《乾度曆》「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日行四分，謂取周天  $365 \frac{1}{4}$  度，而月行與四分曆的  $13 \frac{7}{19}$  度不同，即微增其度。究竟「微增」多少，並無明言，不過，《長曆》必定改變了《乾度曆》的「月行」度，故較諸經傳曆日，其相合數遠超《乾度曆》及以前諸曆。

對於此種「微增月行」的曆術，《唐開元占經》所載的諸古曆中，並無《乾度曆》。有學者認為，「日行速度既定，若用十九年七閏法，月行速度也是固定的。《乾度曆》『微增月行』速度，必然導致閏法的改變。而改變閏法這樣的大事，史書豈能不載？……即是說，《乾度曆》也不是嚴格依照曆理、公式推算的，像《長曆》一樣帶有隨意性」，<sup>(註6)</sup>說頗精審。關鍵是如何把握《長曆》的此種「隨意性」。

通常的看法是，杜預既提到《長曆》曲循經傳曆日的特點，那麼此種「隨意性」必然以經傳曆日為準。此說固是，不過，實情卻遠為複雜。

首先，若僅僅為符合經傳曆日，曆譜編排當不止一種。比如，清代顧棟高〈春秋朔閏表〉也不依曆理，但在頻大月的設置上，二者差異不可謂不大。顧氏〈春秋朔閏表〉隱公世頻大月編排如下：

1. 隱二年閏十二月己巳大，隱三年正月己亥大。
2. 隱五年十一月壬午大，十二月壬子大。
3. 隱六年正月辛亥大，二月辛巳大。
4. 隱六年十二月丙子大，隱七年正月丙午大。
5. 隱十年五月丙戌大，六月丙辰大。
6. 隱十年十二月癸丑大，隱十一年正月癸未大。<sup>(註7)</sup>

以上法驗之，隱公六年正月、二月既為頻大月，則十二月及隱七年正月就不可能再是頻大月。隱公十年五月、六月為頻大月，則同年十二月與明年正月更不可能是頻大月。顧氏自言編排朔閏之法：「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為置閏。」<sup>(註8)</sup>

6. 劉洪濤，《古代曆法計算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237。

7.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頁41下-49上。

8.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頁38上。

知顧氏設置頻大月，也以經傳曆日為準，不依曆算。

杜預《長曆》與顧棟高〈朔閏表〉皆以經傳曆日為準，然在頻大月的設置上有如此差異，可以想見依經傳曆日編排的曆譜，存在著伸縮餘地。以隱公世為例，若《長曆》完全依曆算設置頻大月（即大餘加 29，小餘加 499），其結果與經傳曆日並不衝突。或者，即使《長曆》不依曆算，也可編排出另一曆譜以符合經傳曆日，不必如今所見者。

其次，若為迎合經傳曆日，則哀公十八年之後，傳文曆日極少，對曆譜編排影響甚微，不必「曲循經傳曆日」，在此情形下，應盡可能依曆理而編排。但實際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也以頻大月為證，見下表：

**表二：《長曆》哀公十八年後的頻大月設置**

《長曆》頻大月之設	與上頻大月間隔之月數
哀十八年七月乙丑大，八月乙未大	此前，哀十七年四月、五月頻大，與此相隔 17 月
哀十九年九月戊子大，十月戊午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年十二月辛亥大，哀二十一年正月辛巳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二年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三年五月丁酉大，六月丁卯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四年八月庚申大，九月庚寅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五年十月癸未大，十一月癸丑大	相隔 15 月
哀二十七年正月丙午大，二月丙子大	相隔 15 月

表中，自哀公十八年始，杜氏頻大月之設，均以 15 月為間。若以四分曆小餘加 499 為算，則頻大月的間隔應為 15 月或 17 月，不可能在九年內續以 15 月。今杜氏既以 15 月間設頻大月，若依此檢驗《長曆》其他年份的頻大月編排，結果是，頻大月間隔以 15 月、17 月為多，其餘則或前或後，少者相間 9 月，多者相間 40 餘月，也有相間 20 餘月者。由此可見，《長曆》設置頻大月不全依 15 月之例，問題在於，《長曆》如此變動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對此，有的可用「曲循經傳曆日」釋之，有的不然。

比如，隱公十一年《長曆》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大，距前頻大月 17 月，其後桓公二年《長曆》二月庚午大，三月庚子大，去前亦 17 月。若依小餘加 499

爲算，則桓公三年的頻大月設置不可能再間隔 17 月，應是 15 月，即五月癸巳大、六月癸亥大，如此，則七月癸巳小，但經文有七月壬辰朔日食，與此不合，故《長曆》仍以 17 月爲間，置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大，實際上退後 2 月，則與壬辰朔合。又如，莊公二十七年三月辛卯大，四月辛酉大，此去前頻大月共 21 月，莊二十八年十一月辛亥大，十二月辛巳大，距前亦 21 月，而莊公三十年《長曆》九月庚午大，十月庚子大，距前 23 月。此後，莊三十二年五月、六月頻大，閔公二年二月、三月頻大，僖公元年十月、十一月頻大，僖公三年六月、七月頻大，皆相去 21 月，因此，若莊三十年仍隔 21 月，則七月辛未大，八月辛丑大，九月辛未小，而經文就有九月庚午朔日食，與此不合，故退後 2 月。此類例證說明，在經傳有晦朔日的前提下，頻大月的前後伸縮，將有利於符合經傳曆日，這是杜氏「曲循經傳曆日」的體現。

但其中也有不可解者。如宣公四年《長曆》十月丙辰大，十一月丙戌大，此前，宣元年二月戊申大，三月戊寅大，二者相去 45 月。驗諸經傳曆日，自宣公元年至四年，經傳共六曆日，即宣二年二月壬子，九月乙丑，壬申，十月乙亥，宣三年十月丙戌，宣四年六月乙酉，七月戊戌。據《長曆》編排，這些曆日與晦朔相隔甚遠，因此，杜氏若依前例，以間隔 15 月或 17 月計，甚至間隔二十餘月，皆與經傳曆日無不合，但宣二年或宣三年竟不設頻大月，致使頻大月相間達 45 月，既與哀十八年後的 15 月之例不合，也不合他處的頻大月之例。又如，成公元年《長曆》五月辛卯大，六月辛酉大，成公二年則是二月丁巳大，三月丁亥大，二者相去僅 9 月，也違於《長曆》常例。以經傳曆日驗之，經文有四月丙戌，爲合此曆日，《長曆》頻大月之設可以前移一月，即：正月戊子大，二月戊午小，三月丁亥大，四月丁巳大，五月丁亥小，丙戌即爲四月晦，且與其他曆日無不符。同例如成公三年頻大月編排，亦間 9 月，然可以遵循經傳曆日釋之。（註 9）

由上可知，《長曆》設置頻大月，有的據經傳曆日，有的與經傳曆日無關，有的甚至違背經傳曆日。杜云「曲循經傳曆日以攷晦朔」，在頻大月的設置中，實情並非全是如此。此間緣由，因《集解》與《長曆》皆無直接論述，未敢斷言。不

9. 案：成公三年正月壬午大，二月壬子大，同年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大，亦間 9 月。若十月、十一月不設頻大月，則是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小，十二月丁未大，而經文有（十一月）丁未，與曆譜不合。故《長曆》此處的頻大月編排有可能是爲了符合丁未日，此不妨視爲「曲循經傳曆日」之例證。

過，從結果上看，頻大月之設，既有一定性（如依經傳曆日），又有隨意性（如不依 15 月之例）。如何把握《長曆》編排的隨意性與一定性，如何理解《長曆》與杜氏曆日考證間的關係，恰恰是經學史層面不應忽略的問題。這一問題與《長曆》的置閏特點互相印證。既知頻大月之設不能十足彰顯「曲循經傳曆日」的特點，則在置閏上，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下文可知，《長曆》置閏也不是完全「曲循經傳曆日」。

### 三、《長曆》的置閏特點，兼及日食之釋

關於置閏之例，杜氏云：「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閏月無中氣」，<sup>（註 10）</sup>由此推知杜氏置閏大抵依十九年七閏及無中置閏法。但「有奇」二字表示，「設閏可能比十九年七閏法靈活得多」。<sup>（註 11）</sup>從《長曆》看，十九年七閏，相當於二百五十五年置九十四閏月。

讓我們先從襄公三十年的曆譜說起，因杜氏自言《春秋》終始閏法，見於此年。<sup>（註 12）</sup>襄公三十年傳云「二月癸未」，《長曆》釋云：

二十三日也。會于承匡之歲，其歲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七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朔，絳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數，故師曠于此年曰：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月三月甲子朔，盡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十日也。其間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奇，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于此也。雖不知春秋時曆本術，今則用此驗眾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皆與古今眾家法符。雖《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大

10.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4 下。

11. 劉洪濤，《古代曆法計算法》，頁 236。

12. 襄廿七年《長曆》云：「《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見杜預，《春秋釋例》，頁 334 下。

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註13)

此段文字是杜氏置閏法的直接描述，但其中有訛，疏通如下。

其一，襄三十年《左傳》載絳縣老人語：「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士文伯以爲「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即26660日。但《長曆》上云「積二萬六千六十日」，顯然，六千下脫「六百」二字。此積日數，乃杜氏承士文伯之語，非《長曆》本數，因《長曆》之積日與此不合。

其二，云「其間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奇」，謂自文公十一年周正三月起，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積月893，中有27閏月，其率： $893 \div 27 = 33 + 2/27$ 。案：據此當云「率三十三月有奇」，杜氏何以言「三十二月有奇」？這是因爲，文公十一年非章都之首，閏月之數容有前移後退。今假設以文公十二年起算（因此年始閏），則積月  $(893 - 10) \div 27 = 32 + 19/27$ 。即三十二月有奇，故杜氏所言，大致不差。

其三，云「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此據《長曆》爲說。《長曆》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算起，至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止，積大月463，積小月409，則積日： $(463 \times 30) + (409 \times 29) = 25751$ （日）。杜云「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非爲算上言，乃盡乙亥朔言。

其四，云「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千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于此也」，此中亦有訛。乙亥朔謂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朔，自此（不含此日）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不足三年，豈有九千餘日？今以《長曆》爲算，其間積大月16，積小月14，加上二月23日，則積日： $(16 \times 30) + (14 \times 29) + 23 = 909$ 日。因不含乙亥朔本日，故  $909 - 1 = 908$ 日。知「九千九百八日」之「九千」實爲衍文，同理，上句「九千」亦爲衍文。又，杜氏何以言「其間當（九千）八百五十日」及「長五十八日」？這是因爲，若不計襄公二十七年的二閏月，總共849日，杜氏「八百五十日」，或有誤，或僅言概數，若加上此二閏月，則總共908日，長59日。由於《長曆》襄公二十七年

13. 杜預，《春秋釋例》，頁336上-下。



所置二閏爲一大一小，則相差必是 59 日，杜云「長五十八日」，或因「八百五十日」而致誤。總之，只要杜氏認爲「再失閏，復於此」，則據《長曆》置二閏的一大一小，必是 59 日，故文中「五十八」，定是「五十九」之訛。

其五，云「雖不知春秋時曆本術，今則用此驗眾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皆與古今眾家法符。雖《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其義有二：

1. 「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不確。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應是百一十三年（算上），非一百七年。若以 107 年爲算，則止於隱公六年，自此年計至文十年，《長曆》只有三十六閏月，非三十九閏。又據《長曆》自文十年上算隱公元年，僅三十八閏，故杜氏云「隱之前年」，謂惠公末年，此年《長曆》未排曆譜，但據此文，知此年有閏，故合爲三十九閏。

2. 「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襄公三十年至哀十七年算上，七十六年，《長曆》共二十八閏月，故《春秋》經傳閏月之總數： $39 + 27 + 28 = 94$ 。知下文「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此「年」上當脫「五」字，因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爲二百五十五年。

由上可知，杜氏認爲，經傳置閏的大致之例以三十二月有餘爲率，二百五十五年爲九十四閏，相當於十九年七閏，故《長曆》云經傳閏數與「古今眾家法符」。

不過，所謂十九年七閏或三十二月有餘之率，僅是概數。由於《長曆》置閏遠者間達七十月（如僖公十二年閏二月，次閏至僖公十七年閏十二月，相間七十月），近者頻年而設，甚至一年二閏（見下）。所以，十九年七閏之法，既不能提供準確的閏月位置，也不能揭示《長曆》置閏的依據，如《長曆》雖云惠公末年有閏，但人們無法還原出《長曆》此年的曆譜。同理，隱公九年，《長曆》爲何閏在十月，而不是閏在九月，其間緣由亦無從得知。對於此類置閏，「曲循經傳曆日」之說並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釋依據。故問題是，《長曆》置閏與經傳曆日的關係究竟如何？

以文公元年爲例，經有二月癸亥日食，傳有五月辛酉朔，故傳文閏三月之說可取，《長曆》即依此而閏三月。傳既有五月辛酉朔之定點日，可推七月庚申朔，九月己未朔，十一月戊午朔，明年正月丁巳朔，二月爲丁亥朔，即使中有頻大月，

也僅一日之差，而文公二年經傳均有二月甲子之曆日，甲子去丁亥近四十日，不在一月，故杜推測其間當有閏月，若不置閏，不僅經傳二月甲子不合曆日，此年其他曆日亦不合，如二月丁丑，三月乙巳等皆不合。又因文公元年經傳俱有十月丁未之曆日，故閏月當在十月至明年正月間。《長曆》則以文公二年為閏正月。此例表明，《長曆》有據經傳曆日而置閏者。

但《長曆》置閏有時與經傳曆日無直接關係，甚至有不可解者。如閔公二年《長曆》閏五月，僖公元年閏十一月，為頻年置閏之例。由於頻年置閏大違曆理，若非明確失閏，曆譜編排即不應用此法。以曆日驗之，僖公二年經有五月辛巳日，即使為迎合此曆日，亦無須在元年十一月置閏，可在二年四月置閏，既可避免頻年置閏之嫌，且合經傳曆日。今《長曆》於僖元年十一月置閏，實不可解。

《長曆》置閏有時依經傳曆日者，有時不依經傳曆日，此與頻大月之設頗有幾分類似。不過，二者也有區別，《長曆》置閏除了直接依經傳曆日外，還有其他依據，而這些依據在頻大月之設中並無體現。

首先，《長曆》直接據傳文置閏，其表徵是，傳有閏月之文，《長曆》即據此置閏。如僖公七年傳有「冬……閏月，惠王崩」之文，故《長曆》此年於十一月置閏，前加「傳」字。又如文公元年傳有「閏三月」之文，故《長曆》此年亦閏三月，並加「傳」字。昭二十二年傳有「閏月……，取前城」之文，《長曆》閏十二月，前亦有「傳」字。哀公十五年《長曆》云「傳閏十二月」，亦同例。諸如此類，皆是《長曆》據傳置閏之證。故知昭公二十年《長曆》「閏八月丁巳小」，閏前宜加「傳」字，因此年傳有「閏月戊辰」之文。

但襄公九年傳有「閏月戊寅」之文，曆譜雖有「傳閏月」字樣，卻不標朔日干支，是《長曆》以為傳文誤，此年不應有閏，與上述諸例俱異。對此，杜氏解釋如下：

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傳文必言「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相去十六日。癸亥，門其三門，門各五日，為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於敘事及曆皆合。然則，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也。傳曰「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則向所代鄭門、師之梁、及

北門也。晉人三番四軍，以三番為待楚之備，一番進攻，欲以苦鄭而來楚也，五日一移，楚不來，故侵掠而還。殆必如此，不然，則二字誤。

(註 14)

杜氏認為，傳文「閏月戊寅」當為「門五日戊寅」之訛。因「門五」與「閏」形近而訛，「日」亦隨之訛作「月」。杜氏之據有二，一為「敘事」，一為「曆」。敘事於文中可見，曆則較為隱晦，下文稍作引申。

襄公九年、十年的經傳曆日不少，除經傳互歧而致誤外（如經云「十二月己亥」，傳則云「十一月己亥」，杜以為經非傳是），其他曆日仍是考察此年是否有閏的重要依據。今假設如傳所言閏十二月，因傳文還有十二月癸亥日，則閏月朔日必在甲子至戊寅間，由此可推襄十年二月朔日必在癸亥至丁丑間，四月朔日當在壬戌至丙子間，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然十年傳文有四月戊午日，無論朔日是壬戌還是丙子，皆不合。同理，傳有五月庚寅，也與此不合，因五月朔日當在壬辰至丙午間，庚寅與此相去至少四十餘日。另外，據閏十二月朔日在甲子至戊寅間，還可推襄九年十一月朔日當在乙丑至己卯間，九月朔當在丙寅至庚辰間，七月朔在丁卯至辛巳間，五月朔在戊辰至壬午間，而經文有五月辛酉、八月癸未日，皆與此不合。所以，若據傳文閏在十二月，則經傳曆日多與此不合，此其一。又「門五」與「閏」形近，傳文敘事又與「門五」之推測合，故杜氏以為傳文「閏月」誤，此其二。如此，則「門五日」訛作「閏月」不無可能。楊伯峻先生也認為杜說可信。(註 15)

除依傳文置閏外，《長曆》還依據文意置閏，其典型例證，為一年置二閏。

襄公二十七年經文「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也。」

杜氏注經云：「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又注傳云：「謂斗建申。周之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

14. 杜預，《春秋釋例》，頁 324 下-325 上。

1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修訂版），第二冊，頁 969。

詳矣。」<sup>(註 16)</sup>

《長曆》此年置閏如下：「十一月建申乙亥大，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建戌甲戌大，十二月建亥甲辰小。」<sup>(註 17)</sup>此即一年置二閏之特例。

案：經文十二月乙亥朔，傳改爲十一月乙亥。考經文七月有辛巳日，則乙亥朔當在十一月，不可能在十二月，除非其間有閏月。<sup>(註 18)</sup>而《左傳》以十一月改之，正認爲其間無閏。周正十一月，當十二支之戌，傳云「辰在申，再失閏」，說明傳以爲經之「十一月」乃失二閏所致，本應是九月申，而今卻是十一月戌。對此，杜預也以爲傳是經非。據《長曆》，自文公十一年至襄二十七年，若依十九年七閏之法，應有二十六個閏月，但《長曆》所置之閏月總共才二十四閏，此二月的差數，在杜預看來乃失閏所致。

既爲失閏，則須補閏，《長曆》爲何不補他處，而於襄二十七年頓置二閏呢？杜氏的解釋如下：

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置以要之（要，《正義》作「安」），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曆，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曆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于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以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sup>(註 19)</sup>

杜氏認爲，傳雖改十二月爲十一月，而十一月斗建在戌，但魯之司曆「以儀審望」，斗實建在申，由此知時曆已失兩閏。故《長曆》在編排時加上「建申、建酉」，至十二月建亥，以求合天。這是杜氏據傳文「辰在申」而置二閏的原因之一。杜氏還有另一考慮，即襄二十八年正月經文有「春，無冰」語。「春，無冰」，乃記災

1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下冊，頁1998上。

17. 杜預，《春秋釋例》，頁333上。

18. 江永，《群經補義》，頁29下-30上云：「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案：江說或是，但有一前提，即七月至十一月間無閏月，假設此年閏十月，則乙亥朔恰可屬十二月。

19. 杜預，《春秋釋例》，頁334上-下。

異，傳文載梓慎語以爲宋、鄭之災，是其證也。既爲災異，則非常事。由於魯曆（或稱時曆）仍以周正建子爲歲始，春季正、二、三月，當今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冬季有冰之時，無冰，即爲非常態。在時曆失二閏的情形下，若不於此加置兩閏，則經文「春，無冰」就無法落實，因爲時曆之「春」，相當於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屬秋季，無冰乃常事，經不必書，而傳引梓慎語以爲宋鄭災，亦與此常事不合。可見，經傳文意已經暗示時曆失二閏之實。故《長曆》於此頓置兩閏，既合於傳文的「辰在申」，也合乎明年經文的「春，無冰」。杜氏云：「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sup>(註 20)</sup>知杜氏又據經傳文意而頓置二閏。

依據文意而置閏，在《長曆》中並不少見，昭公九年經書「夏四月，陳災」，《左傳》載裨竈云「今火出而火陳」。案：昭十七年《左傳》載梓慎云「火出，於周爲五月」，今甫四月，火即出陳，與五月不合，故杜氏以爲此年失閏，因時曆於前年誤置一閏，亦依文意置閏。

以上諸例說明，《長曆》置閏有不同參照，有的據曆日，有的據傳文，有的據文意，還有的兼據文意與曆日。哀公十四年《長曆》閏二月，即出於文意與曆日的雙重考慮。

從文意上考察，哀公十二年經文「十二月，螽」，傳云：「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孔子之意，謂火（心宿二）不見，已是天寒，飛蟲蟄入地下。今十二月（當夏正十月），已入冬，火不應見，而猶見於西方，乃司曆者之誤，杜氏正是據此認爲時曆失閏。

從曆日方面考察，哀十三年傳有六月丙子、丁亥、七月辛丑等曆日，哀十四年經有四月庚戌曆日。以此爲算，中間必有閏月。已知六月丁亥、七月辛丑，則七月朔必在戊子至辛丑之間，可推九月朔在丁亥至庚子間，十一月朔在丙戌至己亥間，明年正月朔在乙酉至戊戌間，三月朔在甲申至丁酉間，則四月朔當在甲寅至丁卯間，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庚戌去甲寅、丁卯四、五十日，不可能在一月，欲合四月庚戌，則須閏月，此其一。且傳有五月庚申朔日食之定點日，由此推得四月朔或庚寅或辛卯，也與上推四月朔在甲寅至丁卯間不合，惟置閏方

20. 杜預，《春秋釋例》，頁 334 下。

合，此其二。總之，自哀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四月間，經傳曆日顯示有一閏。杜氏於哀十四年二月置閏，分明據曆日推算。

閏月之設與經傳曆日的考證關係緊密。比照《長曆》之前的曆法，如前漢《太初曆》，後漢《四分曆》，劉洪《乾象曆》，楊偉《景初曆》等，閏周皆為十九年七閏。只要算出閏餘多少，即可判斷該年是否有閏、閏在何月。換言之，閏月位置是固定的，正如頻大月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今杜氏置閏雖大體遵循十九年七閏法，但閏月之位無準，其置閏特點，可謂一定之中又見無定。言其無定，是因為《長曆》置閏不依閏餘，有明顯的隨意性。言其一定，是因為此種隨意性也不是完全任意，而有相應的參考標準，如經傳之文、前後曆日的勘驗等。正因為有經傳文及曆日的雙重參考，故「曲循經傳曆日」之說不為無據，又因為以經傳文意為參考，故知「曲循經傳曆日」在《長曆》中並未完全貫徹。因而，不可因「曲循經傳曆日」之言而忽略《長曆》置閏的多重依據，正如頻大月之設也不全是「曲循經傳曆日」一樣。只有理解《長曆》設置閏月與頻大月的隨意性與一定性特點，方可進一步考察《長曆》編排何以失三十三曆日的緣由。

但在展開討論之前，須對杜氏的日食之釋稍作交代，因杜氏曾提及「據日食以攷晦朔」。按照現代天文學的觀點，日食是編排曆譜的可靠起點，天文學者可通過還原古代日食的確切之期，以驗證《春秋》經傳中的日食記載是否有偏差，並據以編出更為準確的曆譜。新城新藏在《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中即提及此法。<sup>(註 21)</sup>

然杜預編排《長曆》，日食並非編排曆譜的起點。經傳中的日食之期，在杜氏的觀念中，只是作為朔晦日的判斷依據，至於某年某月是否出現日食，不在杜氏的考察範圍內，故經有頻月而食者，雖不合曆理，仍是杜氏編排曆譜朔日的重要依據。此種情形在劉歆的《春秋》日食說中已有體現，《漢書·五行志下之下》載劉歆改動經傳日食之期，即以朔日法為準，而不依食限。<sup>(註 22)</sup>正因為日食之期只是作為朔日的依據，若經傳前後的多數曆日與日食之期矛盾，杜氏即斷此日食之期有誤。比如，昭公廿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食，此例據張培瑜〈《春秋》日食表〉，

21. 新城新藏撰，沈璿譯，《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上海：中華學藝社，1933），頁 295。

22. 參見鄧欽意，〈釋《漢書·五行志》中的《左氏》日食說〉，《中國史研究》，2（北京：2009），頁 25-40。

不誤，(註 23)而杜氏以爲癸酉誤，當爲癸卯，其依據便是經傳曆日。(註 24)其他日食之判斷，亦同此例。如：

1.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食，《長曆》推得甲子爲七月晦，非朔日。

2.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食，《長曆》推得丁巳爲七月朔，非八月朔。

案：宣公八年經文「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注》：「無傳，月三十日食。」(註 25)《長曆》此年曆譜爲七月乙未朔、八月乙丑朔，甲子爲七月三十日晦。杜氏如此斷定經文日食之誤，是因爲經文曆日互有歧異。宣公八年經文有六月辛巳、壬午、戊子之曆日，知七月之朔日必非甲子，因辛巳、戊子等去甲子遠超三十日，且經並有十月己丑、庚寅之曆日，若甲子爲七月朔，則十月朔當爲癸巳，即使中有頻大月，也僅一日之差，而己丑、庚寅去癸巳五十餘日，不在一月內。故七月若是甲子朔，則與此年所有曆日皆違，在經文日食之期或晦、或朔、或二日的前提下，甲子既無朔、二日之可能，則杜氏以甲子爲七月晦，合於其他曆日。

襄公十五年經文「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注》：「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註 26)案：此年經文曆日有二月己亥、十一月癸亥，若八月丁巳朔，則可推十一月朔或丁亥或丙戌，癸亥距此三十餘日，不合。同樣，由八月丁巳朔可逆推此年二月朔當爲庚申，而經文二月己亥也與此不合，且二月己亥又合於前年之曆日，(註 27)知八月丁巳朔與前後曆日皆不合。故杜云「八月無丁巳」。

由此二例，知杜氏判斷日食之期正誤，亦依經傳前後曆日互相參校。此法既與判斷昭廿二年十二月朔無癸酉有癸卯一致，(註 28)也與設置閏月或頻大月的依據

23. 見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246。

24. 杜氏云：「傳十二月下有閏月，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二十二年十二月不得有癸酉，癸酉，閏月朔也。又傳十二月有庚戌，計癸酉在庚戌前三十七日，則十二月亦不得有癸酉朔也。以此推之，十二月癸卯朔。經書癸酉，誤也。」見杜預，《春秋釋例》，頁 350 上。

25.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73 下。

26.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59 中。

27. 由襄十四年有二月乙未朔之定點日，可推此年四月甲午朔，六月癸巳朔，八月壬辰朔，十月辛卯朔，十二月庚寅朔，襄十五年二月己丑朔，己亥爲十一日，即使中有頻大月，也僅一日之差。

28. 經傳三十七日食中，《長曆》合者三十三，失者四(其中不包括「三無甲乙」例，即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此三例無干支日，故無法驗證曆譜之相合與否)，此四例中，除文中介紹的三例外，還包括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食，《長曆》推得乙亥爲十一月朔，合傳不合經。其法與他例無異。

相符。明乎此，即可進而考察杜氏如何解決《長曆》與經傳曆日不合的情形。

#### 四、杜氏「參校曆日」考釋

經傳曆日共七百七十九，其中經三百九十三日，傳三百八十六日，而《長曆》得七百四十六日，失三十三日。此三十三曆日之失，杜氏以爲「經傳日月誤」，<sup>(註 29)</sup>並非《長曆》疏漏所致。今以上法一一驗之，以顯現杜氏的參校過程。先列表如下：

表三：《長曆》失三十三曆日與杜氏之釋

經傳曆日記載	《長曆》之釋	備 註
1. 隱二年經八月庚辰	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2. 隱三年傳(十二月)庚戌	十二月無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也	
3. 隱八年傳八月丙戌	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4. 隱十年傳六月戊申	六月無戊申，五月二十三日也。上有五月，則誤在日	
5. 隱十年傳九月戊寅	九月無戊寅，八月二十四日也。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6. 桓十七年經二月丙午	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7. 僖九年經七月乙酉	七月無乙酉，八月二日也，日月必有誤	《集解》未見考證
8. 僖十八年經八月丁亥	經傳俱言八月，(八月)無丁亥，誤也	
9. 僖卅三年經十二月乙巳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也。經書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異也	

29.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7 上。



10. 文四年經十二月壬寅	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誤	《集解》未見考證，經文作十一月壬寅
11. 文六年傳十一月丙寅	十一月無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	
12. 文十三年經十二月己丑	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十一日，日月誤也	
13. 文十四年傳七月乙卯	七月無乙卯，上有六月，下有八月，則誤在日	
14. 鄭文公四年(當魯莊公二十五年)傳二月壬戌	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三月二十日也，日月必有誤	傳文見於文公十七年，故列於此
15. 宣九年經九月辛酉	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誤在日	
16. 宣十二年經十二月戊寅	十二月無戊寅，十一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也	
17. 成二年經四月丙戌	四月無丙戌，五月一日也	
18. 成十七年經傳十一月壬申	十一月無壬申，《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於狸脈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	
19. 襄元年傳(正月)己亥	正月無己亥，誤也	
20. 襄二年經六月庚辰	七月九日也，書於六月，經誤也	
21. 襄三年經六月戊寅	七月十三日也，據傳，盟在秋，經誤也	
22. 襄四年經三月己酉	三月無己酉，二月十七日也，經書己酉，傳言三月，誤也	
23. 襄九年經十二月己亥	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	
24. 襄九年傳閏月戊寅	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	

25. 襄廿二年傳十二月丁巳	十二月無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日月必誤也	
26. 襄廿五年經八月己巳	八月無己巳，七月十二日，然則經誤也	傳文：七月己巳
27. 襄廿八年傳十二月乙亥朔	書十二月無乙亥朔，日誤	
28. 襄廿八年經十二月乙未	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	
29. 昭元年經傳十一月己酉	十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經傳言十一月，誤也。	
30. 昭四年傳八月甲申	八月無甲申，七月二十六日也，上有七月，下有九月，則誤在日也	
31. 昭八年傳十一月壬午	十一月無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誤也	
32. 昭九年傳二月庚申	二月無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必有誤也	《集解》未見考證
33. 昭十年傳五月庚辰	五月無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也，日月必有誤	《集解》未見考證

案：《長曆》計經傳曆日共 779，數起於隱公元年，終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傳文之曆日及於八月辛丑，合此計算，總數恰 779，故知不含哀十五年以後之曆日。

此三十三例中又不含失日食之例，如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長曆》以爲丁巳當爲七月朔，昭廿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食，《長曆》以爲癸酉當爲閏月朔，等等。此類歸屬失日食之例，不在失三十三曆日之數內。

昭十八年，經傳俱云五月壬午，《長曆》云：「五月無壬午，四月二十三日也，日月必有誤。」<sup>(註 30)</sup>此恐是杜氏誤筆，因《長曆》此年四月庚子朔、五月己巳朔，則壬午正是五月十四日，而四月二十三日當爲壬戌，無緣壬午，故此例亦不在三十三曆日之內。如果加上此例，總數則是失三十四曆日。

又，僖二十八年經、傳載踐土之盟，經云五月癸丑，傳云癸亥，是曆日互歧，

30. 杜預，《春秋釋例》，頁 346 下。

《長曆》此年五月丙申朔，則癸丑爲五月十八日，癸亥爲二十八日。一事二日，其中必有一誤，然經傳皆合《長曆》，此類亦不計在失曆日例中。

另外，昭公二十二年經文「冬十月，王子猛卒」，傳云：「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經傳紀月互異，杜推得乙酉在十一月，故《注》云「經書十月誤」。<sup>(註 31)</sup>此例經文無干支曆日，亦不在三十三曆日之內。

最後，文公四年經文「十有一月壬寅」，《集解》未見考證。然《長曆》云：「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誤。」<sup>(註 32)</sup>是杜氏所見經文爲十二月壬寅，故《長曆》推經文有誤。但後刻本皆爲十一月壬寅。考《長曆》文四年曆譜，十一月庚子朔，則壬寅爲十一月三日，正合。對此，《四庫提要》認爲，杜氏所見實爲十二月，故《長曆》正之。其證並有襄公六年經文「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前則曰「十有一月，齊侯滅萊。……十一月丙辰，而滅之」，然《長曆》逕云「十二月丙辰」，未加考證，是杜氏所見本爲十二月丙辰，非如近刻「十一月丙辰」也。<sup>(註 33)</sup>《提要》之說雖非鐵證，然足資參考。今以三十三日衡之，知《長曆》並計文四年「十二月壬寅」之例。

明乎失三十三日之確切所指，下面逐一考察杜氏如何參校上下曆日的過程。

隱公二年經有八月庚辰日，杜以爲八月無庚辰，這是因爲隱三年經有二月己巳日食之定點日，以此可逆推隱二年十二月庚午朔，但因經有十二月乙卯，二者相隔四十餘日，故杜氏推此間必有閏月（《長曆》閏十二月即是證明），因十二月有閏，則十一月辛未朔，九月壬申朔，八月朔即是壬寅，即使其間有頻大月，也僅一日之差，而庚辰距壬寅三十八日，知八月必無庚辰，故《長曆》云「八月無庚辰」。

隱公三年經文「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傳云：「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石門之盟既在十二月，傳所云「庚戌」，在石門後，故杜氏亦繫諸十二月。然下有十二月癸未之曆日，癸未去庚戌三十三日，不在一月，故云十二月無庚戌，此其一也。又此年有二月己巳日食之定點日，以此爲準，可推四月戊辰朔，六月丁卯朔，八月丙寅朔，十月乙丑

31.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2100 下。

32. 杜預，《春秋釋例》，頁 301 上。

33. 杜預，《春秋釋例》，頁 3 上。

朔，十二月甲子朔，即使中有頻大月，也僅一日之差，而庚戌去甲子四十六日，也不在一月，且其他曆日皆合，此其二也。故杜推十二月無庚戌。

隱公八年傳有八月丙戌，《長曆》以爲丙戌誤，杜云：「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sup>(註 34)</sup>顯然辛卯、庚午相間僅二十一日，不容一月，故杜推八月無丙戌。

隱公十年傳六月戊寅，《長曆》以爲戊申誤，這是因爲此年經傳俱有六月辛巳之曆日，六月既有辛巳，則不得有戊申，因二者相間三十三日。經傳皆言「(六月)辛巳，取防」，杜推傳文六月戊申誤。

隱公十年傳有九月戊寅，《長曆》以爲九月無戊寅。案：經有六月壬戌、辛巳之曆日，傳有七月庚寅等曆日，則此年七月朔當在壬午至庚寅間，由此可推九月朔必在辛巳至己丑間，無論朔在其間何日，戊寅均相去五十日左右，故知九月無戊寅。

桓公十七年經二月丙午，杜云「二月無丙午」，箇中原因，是因爲經有正月丙辰日，則二月無丙午，因丙辰至丙午相間五十餘日。然則，杜氏爲何不依「二月丙午」而證「正月無丙辰」呢？這是因爲，經還有五月丙午日，五月既有丙午，則二月不得有丙午，有正月丙辰、五月丙午等參照，故杜云「二月無丙午，日月必有誤」。由此可知，當經傳曆日互異，且須選擇其一時，誤差之小是杜氏選擇的依據。

僖公九年經有七月乙酉，《長曆》云七月無乙酉。案：僖公十二年有三月庚午日食之定點日，以此逆推，可得此年正月辛未朔，僖十一年十一月壬申朔，九月癸酉朔，七月甲戌朔，五月乙亥朔，三月丙子朔，正月丁丑朔，僖十年十一月戊寅朔，九月己卯朔，七月庚辰朔，五月辛巳朔，三月壬午朔，正月癸未朔，僖九年十一月甲申朔，九月乙酉朔，七月丙戌朔，五月丁亥朔，三月戊子朔。即使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以此驗以僖九年曆日：經有三月丁丑，與此不合；經有九月戊辰、甲子，亦不合；惟經有七月乙酉，若爲頻大月，可合。案：以上所推，是以僖九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無閏爲前提，無閏而失三曆日，誤差過大。故杜氏認爲此間應閏，證之《長曆》，置閏在僖十二年二月，雖七月乙酉不合，但僅失一

34.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733中。

曆日。兩相權衡，亦知杜以失曆日少者爲可取。

僖公十八年經有八月丁亥，杜氏以爲八月無丁亥。案：僖公十六年經有正月戊申朔之定點日，以此順推，直至僖公十七年十二月，得丁卯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經傳共七曆日，皆合，知此間並無閏月。若依此再下推，可得五月甲午朔，八月癸亥朔，經文曆日則是五月戊寅，不合；八月丁亥，合。今杜氏以爲五月戊寅合，八月則無丁亥，是杜氏認爲僖十七年十二月至僖十八年五月間，有一閏。杜氏如此置閏，或許慮及僖十九年六月己酉之曆日。如果前不置閏，欲合此曆日，須在僖十八年八月至僖十九年六月間置閏，然此閏月位置距後閏僖十九年四月之閏太近，距前閏僖十二年二月之閏太遠，相較而言，於僖十七年十二月至僖十八年五月間置閏更爲可取。準此，杜云八月無丁亥。

僖公三十三年經文有十二月乙巳之曆日，《長曆》以爲十二月無乙巳。案：文公元年經有二月癸亥日食之定點日，據此可逆推僖卅三年十二月朔或甲子、或癸亥，乙巳去甲子、癸亥四十餘日，不應同月，故杜以爲十二月無乙巳。且經文並有「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其義亦合於十一月。(註 35)

文公四年經十二月壬寅，後刻本皆作十一月壬寅，恐非，前已釋。

文公六年傳有十一月丙寅，杜氏以爲十一月無丙寅。案：文公七年經傳有三月甲戌、四月戊子之曆日，知四月朔當在乙亥至戊子間，以此逆推，可得此年二月朔在丙子至己丑間，文六年閏十二月朔在丁丑至庚寅間，(註 36)則此年十一月朔必在戊寅至辛卯，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丙寅去戊寅、辛卯遠超三十日，不在一月，故杜推斷十一月無丙寅。

文公十三年經有十二月己丑，杜氏以爲十二月無己丑，此可結合下例明之：

文公十四年傳有七月乙卯，《長曆》以爲七月無乙卯。案：文公十五年有六月辛丑朔日食之定點日，由此逆推，此年四月壬寅朔、二月癸卯朔，文十四年十二月甲辰朔，十月乙巳朔，八月丙午朔，則七月丙子朔，六月丁未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乙卯、丙子相間三十九日，不在一月，故云七月無乙卯。

35. 杜《注》云：「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正義》云：「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災也。」（見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32 下）。案：經文但言「隕霜」，未言「重」。以常理推之，九月之霜當微不當重，不殺草，屬常事。今杜氏云「霜當微而重」，加「重」，雖有增字解經之嫌，卻合經文「常事不書」之例。

36. 此年閏十二月，有經傳文可證，故《長曆》依此置閏。

且據此定點日所逆推出的曆譜合于經傳其他曆日，如經有六月癸酉、九月甲申等，故杜氏判斷傳七月乙卯之曆日爲誤。

由此可知，自文公十五年六月日食，前推文十四年六月丙午朔，爲符合經傳曆日，其間不應置閏。以此爲準，上推至文十三年五月壬午朔，知經文五月壬午、十二月己丑兩曆日中，五月合，十二月不合。如果欲合十二月己丑，必須在五月至十二月間置一閏，但此結果勢必不合明年的六月癸酉、九月甲申之曆日。前後斟酌，故杜云十二月無己丑。

宣公九年經有九月辛酉，杜氏云九月無辛酉。案：宣公十年有四月丙辰日食之定點日，由此可逆推此年二月丁巳朔，宣公九年十二月戊午朔，十月己未朔，九月己丑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辛酉去己丑三十二日，不在一月，故杜以爲九月無辛酉。

宣公十二年經有十二月戊寅，杜云十二月無戊寅。今以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日食順推，則六月乙卯朔，八月甲寅朔，依此可得宣十二年六月壬寅朔，三年之間即使有二次頻大月，誤差僅二日，而經傳此年六月有乙卯、丙辰、辛未之曆日，皆合。因此，欲合經傳六月之三曆日，或不置閏，或置二閏，即使置二閏，六月壬寅朔，誤差仍不超過二、三日，準此，則十二月朔當在己亥，誤差也不超過二、三日，然經有十二月戊寅，去己亥三十九日，故杜判斷十二月無戊寅。

成公二年經有四月丙戌，《長曆》以爲四月無丙戌，此例最爲不可解。見前頻大月之分析。

成公十七年經傳俱有十一月壬申，杜以爲十一月無壬申。案：經有十二月丁巳朔日食，則知十一月朔或丁亥、或戊子，壬申去此四十餘日，不在一月。且傳於此年十二月下有閏月之文，故知十一月無閏，則經傳「十一月壬申」必有誤。

襄公元年傳云「春，己亥」，杜《注》：「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sup>(註 37)</sup>案：成公十八年傳有二月乙酉朔之定點日，由此順推，此年四月甲申朔，六月癸未朔，八月壬午朔，十月辛巳朔，十二月庚辰朔，則襄公元年正月朔當爲庚戌，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己亥去庚戌近五十日，故正月無己亥。又因經傳俱有十二月丁未之曆日，知其間不應閏月，若有閏，必是成

37.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28 上。

公十八年閏十二月，雖合「正月己亥」，卻不合下文襄元年經「九月辛酉」之曆日，故杜氏參校上下，推正月無己亥。

襄公二年經有六月庚辰，傳有七月庚辰，杜氏以爲經非傳是。案：經文七月之下，並有己丑之曆日，今假設經是傳非，則七月朔必在辛巳至己丑間，以此爲準，前後推移，則不合他年之曆日甚夥，如推得成公十八年二月朔當在乙丑至癸酉間，與乙酉朔相差甚遠，即使中有閏月，也不合於乙酉；其他曆日多有不合，故杜氏以爲傳是經非。若庚辰爲七月，則其他曆日皆合。

襄公三年經「(六月)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云「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經、傳不同。《長曆》之法，當與上例同，即參校遠年曆日，以爲經非傳是。襄公四年經「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傳云：「三月，陳成公卒。」《長曆》以爲三月己酉，經傳皆非，因本年或鄰年之曆日，無法確定其中何者爲是，其法亦是參校遠年曆日。

以上諸例，足以彰顯杜氏「參校上下」的考證之法，其實，《長曆》中也有直接展示此法者，襄公九年經十二月己亥，杜云：

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註38)

襄九年經有十二月己亥，傳則是十一月己亥，經傳互異，必有一誤，且傳並有十二月癸亥之文，己亥去癸亥二十四日，若己亥在十二月，則十二月朔必在癸巳至己亥間，依此，則此年十月朔當在甲午至庚子間，然傳文有十月庚午、甲戌，與此不合，故杜氏以爲傳是經非。同樣的例證見於昭公元年經傳十一月己酉，見上表杜氏之釋。

襄公二十二年傳有十二月丁巳，杜云「十二月無丁巳」。案：襄公二十一年有十月庚辰朔日食，據此可推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或是癸酉朔，或是壬申朔，此又與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合，而丁巳與癸酉、壬申相去五十餘日，故知「十二月無丁巳」。

襄公二十五年經有八月己巳，傳則是七月己巳，經傳互歧，杜以爲經非傳是。

38. 杜預，《春秋釋例》，頁324上-下。

案：襄二十四年經有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食，襄二十六年傳有三月甲寅朔之曆日，前後可互推。由襄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可知此年正月乙卯朔，襄二十五年十一月丙辰朔，九月丁巳朔，八月當爲丁亥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差一日，而已巳去丁亥四十餘日，不合。故杜云八月無己巳。

襄公二十八年傳有十二月乙亥朔，《長曆》此年則是戊戌朔。案：傳有十一月乙亥之文，則十二月不應乙亥朔。且傳有十月丙辰、十一月丁亥，皆與十二月乙亥朔不合，故杜云十二月無乙亥。又，此年經有甲寅、乙未兩曆日，因甲寅、乙未相去四十一日，不在一月，亦知經文原有誤。

昭公元年經傳俱有十一月己酉，因傳有十二月甲辰朔，己酉去甲辰五十五日，且傳文還有十二月庚戌之曆日，故推十一月無己酉。

昭公四年傳有八月甲申，《長曆》推八月無甲申。案：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昭二年有七月壬寅，昭三年有正月丁未，若不於二年七月前置閏，則《長曆》不合此二曆日，故《長曆》置閏在昭元年十二月後。以此順推，則昭二年正月癸卯朔，三月壬寅朔，五月辛丑朔，七月庚子朔，九月己亥朔，十一月戊戌朔，昭三年正月丁酉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差一日，而昭三年經傳俱有正月丁未日，合於《長曆》所推，故知此間並無閏月。由正月丁酉朔，可推三月丙申朔，五月乙未朔，七月甲午朔，九月癸巳朔，十一月壬辰朔，昭四年正月辛卯朔，三月庚寅朔，五月己丑朔，六月己未朔，七月戊子朔，八月戊午朔，……十二月丙辰朔，即使中有頻大月，也僅一二日之差，而傳有六月丙午、八月庚申、十二月癸丑、乙卯之曆日，顯而易見，除了八月庚申符合外，其他曆日皆不合，故杜氏須於此年六月前置閏，其結果是其他曆日皆合，而八月無庚申。權衡誤差之大小，杜氏顯然認爲六月前應置閏，《長曆》閏四月，可證。

昭公八年傳云十一月壬午滅陳，經則云十月壬午滅陳，經傳互異。杜以爲經是傳非。考證昭公七年有四月甲辰朔日食之定點日，可推昭八年八月丙申朔，十月乙未朔，十一月甲子朔，據此，則是十一月壬午合，十月壬午不合，經非傳是。而傳文以前之曆日亦無不合。今杜氏以爲經是傳非，乃因於昭九年經文「夏四月，陳災」，傳引裨竈云「今火出而火陳」。案：昭十七年傳引梓慎語「火出，於周爲五月」，今方四月而火出，故杜氏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誤在前年，故



火以四月出。」<sup>(註 39)</sup>因此，《長曆》於昭八年八月後置閏，一方面仍符其他曆日，另方面也合明年四月火出之文。此即杜氏判斷十一月無壬午的真正緣由。以此為準，可推昭公九年二月無庚申，昭公十年五月無庚辰。其法同，茲不贅。

以上諸例，可以顯現杜氏參校曆日的特點及過程。其特點是，杜氏據經傳前後曆日，互相比照，以誤差小者為原則，若某曆日與經傳其他曆日的異數最大，則斷此曆日有誤。其過程是，參校曆日在先，編排《長曆》在後。杜氏先據經傳曆日前後參校，並相應設置閏月與頻大月，目的使《長曆》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經傳曆日。從實際效果看，《長曆》基本實現了符合經傳曆日的目標。《長曆》少三十三曆日，並非曆譜疏失所致，而是經傳曆日本身互有矛盾，因為諸曆譜皆不能涵蓋這些互有矛盾的曆日。故杜氏自信，《長曆》「雖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sup>(註 40)</sup>知曉杜氏失三十三曆日的參校過程，對於後世諸家論《長曆》之得失，即可獲得簡明的判斷標準。

## 五、諸家論說辨析

上文提及襄公九年傳有「閏月戊寅」之文，杜氏以「閏月」乃「門五日」之訛，其說有敘事與曆日的雙重論證，但孔穎達《正義》引衛冀隆駁杜說云：

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為門五日乎？<sup>(註 41)</sup>

衛氏之意，如果閏月可改為「門五日」，那麼，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城，難道也可改為「門五日」？顯然，衛氏的反駁，係針對杜氏的「形訛」說，並未觸及杜氏敘事與曆日的雙重論證。昭二十年、二十二年《長曆》皆據傳而置閏。「門五」不僅無法驗諸傳文之敘事，且經傳曆日俱與置閏合。如昭公

39. 杜預，《春秋釋例》，頁 342 下。

40.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6 下。

41.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43 中。

二十年，傳有七月戊午朔之曆日，若不置閏，則十月朔當在丁亥，十一月朔當在丙辰，但傳文有十月戊辰、經文有十一月辛卯，與朔日相間四十日，皆不合。傳文既然有閏月，而閏月之後的曆日又合於經傳，故《長曆》即依傳置閏；且此年敘事與襄九年並無相似之處，「門五」之訛毫無敘事依據，故衛氏所駁不免意氣用辭。同樣，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傳有閏月辛丑之文，《長曆》亦依此置閏。案：昭二十三年傳文有正月壬寅朔，若不置閏，則昭二十二年十一月朔當為癸卯，則十一月乙酉、己丑等皆不符，故傳文置閏之說可取。惟經有十二月癸酉朔日食之曆日，若置閏，十二月朔當是癸卯，與癸酉不合。對此，杜氏以為是經文傳寫之訛，因傳文有十二月庚戌之曆日，十二月為癸酉朔，則不得有庚戌。故經文或脫「閏」字，或癸卯訛作癸酉。總之，此例《長曆》無閏，係杜氏據經傳敘事及上下曆日的參校，衛氏僅以形訛駁之，不合杜氏之意。

明乎此，可知蘇寬為杜氏所作的辯解，也不合杜氏本旨，孔穎達引蘇氏駁衛冀隆云：

案《長曆》，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為《長曆》於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註42）

蘇氏認為，自丁未至己亥，相隔五十三日，又中間四月，共一百七十三日，若不置閏，十一月有丁未，則四月無己亥；四月若有己亥，則十一月無丁未。所以，《長曆》於襄十年十二月置閏，襄十年既置閏，則九月無閏。頻年不可置閏，是蘇寬為杜氏所作的辯解。

然而，此辯解不合《長曆》之例，如閔二年《長曆》閏五月，僖公元年閏十一月，是頻年置閏；哀公十四年、哀公十五年《長曆》皆有置閏，也屬頻年置閏之例，故蘇氏舉證，並未真正把握杜氏置閏的特點。

又如，文公元年，傳云「閏三月，非禮也」，杜《注》：「於曆法，閏當在僖

42.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943中。

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譏。」<sup>(註 43)</sup>

案：杜氏此注，乃據傳文而發。傳既云「閏三月非禮」，又云「歸餘於終」，故杜氏推閏月當在僖公末年。此為上文據傳意置閏之類型，並非通例。若依經傳曆日，閏月不必皆在歲終，《長曆》中的閏月編排已有充分顯示。而顧炎武《杜解補正》論「閏三月」云：

古人以閏為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曆法故然。」<sup>(註 44)</sup>

顧氏所論，雖合於此例「閏三月」，但以「歸餘於終」統論《春秋》置閏，既不合杜預的本意，也不符經傳曆譜的實情。其以漢初書後九月為例，更不能證明春秋置閏亦在歲末。因為漢初沿襲秦之《顓頊曆》，歲末置閏有明文。至於春秋之曆，是否歲終置閏，頗有可疑。若據經傳曆日及杜氏之意，傳文「歸餘於終」，並不合置閏實情。故顧氏所「補正」者，不可信從。

以上諸說，皆不合於《長曆》的置閏特點。

隱公十年傳有九月戊寅日，杜云「九月無戊寅」，孔穎達《正義》釋云：

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曆》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sup>(註 45)</sup>

《正義》以十月壬午為據，不正確。此年經傳有六月辛巳、七月庚寅日，由此知七

43.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36 下。

44.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 174 冊，頁 303 下。

45.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735 中。

月朔當在壬午至庚寅之間，則九月朔必在辛巳至己丑之間，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戊寅距辛巳、己丑達五十日，故九月必無戊寅。具體而言，據六月辛巳、七月庚寅，即可推出九月無戊寅，《正義》據十月壬午而推，是以後編的《長曆》為說，依據既然不準確，則不能體現杜氏參校上下曆日的過程。再如宣九年經有九月辛酉，杜《注》：「九月無辛酉。」《正義》云：

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酉，杜以《長曆》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註46)

案：僅據十月癸酉，不能推出九月無辛酉，杜氏乃據上下曆日參校。宣十年有四月丙辰日食，則可推宣九年十月己未朔，九月己丑朔，即使中有頻大月，僅一日之差，而辛酉去己丑三十二日，不在一月。且宣九年經有十月癸酉之曆日，亦合，故杜云九月無辛酉。至於「癸酉是十月十六日」，是杜氏在推斷十月無癸酉的前提下，再根據後編的《長曆》而給出確切日期。從前後順序看，考證曆日的有無在先，具體日期的確定在後。孔氏所論，不合杜氏考校曆日的過程，不夠精準。(註47)

又如莊公二十五年經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非常鼓之月。《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註48)

案：常鼓之月，當為夏正四月，即時曆之六月。昭十七年《左傳》云：「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據此，知夏正四月日食，有用幣、伐鼓之禮（文中之正月，謂正陽之月，即夏正四月、周正六月，非謂天正正月）。莊廿五年既是六月辛未朔日食（當夏正四月），則用牲於社、伐鼓於朝，可謂合禮。傳竟云「非常」，顯然認為經書六月

46.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874上。

47. 需要強調的是，曆日考證在先，《長曆》編排在後，這並不否認後出的《長曆》對經傳曆日考證另有解釋之功，比如，隱公元年傳有「五月辛丑」，《長曆》以為二十三日，此辛丑為二十三日的推斷，即據《長曆》而推。案：原作二十二日，恐是傳抄致誤，因《長曆》五月己卯朔，則辛丑為二十三日。

48.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780上。

辛未朔有誤。杜氏正是據傳意云：「非常鼓之月」。若以經文前年八月丁丑爲算，則六月辛未朔不誤，可知杜云「《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乃因傳文「非常」而認爲時曆有失閏之事。《正義》引劉炫說：

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有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註 49）

劉說也以爲辛未非六月朔，但所舉例證與杜氏異。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左傳》引昭子云「日過分而陽猶不克」，是劉炫說所本。彼時爲五月朔，昭子以爲春分已過，陽氣漸強然猶未克陰，可見陰氣之盛，故有日食之應。劉炫釋莊廿五年六月日食，以爲慝未作即已作之辭（此爲經學中的反訓之例），並推測非五月。案：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陰氣強而有日食，莊二十五年日食，若慝已作，正與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合，怎可推出「非五月」？是劉說不合杜氏日食之論及據傳意置閏之特點。

以上學者們各據自家理解，並不依杜氏參校曆日的特點，故所論與杜說多不合。由此可見，理解杜氏參校曆日的過程及特點，是正確解釋《長曆》及經傳注釋的必要前提。又，文淵閣「四庫」本《春秋釋例》文後附元吳萊〈春秋釋例後序〉，云「《長曆》本劉洪《乾象曆》」，（註 50）知吳氏既不明杜氏參校曆日的特點，也不明《乾象曆》的運算之法，其說非也。

## 六、曆日考證中的「從赴」說

據上所述，《長曆》失三十三曆日、四日食，皆因經傳曆日本身互歧，而非曆譜疏失所致，即杜氏所言「經傳日月誤」。（註 51）可是，以 779 曆日驗諸《長曆》，除三十三曆日、四日食不合外，還有七例不合：

1. 桓五年，正月，甲戌，《長曆》：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書於正月，從赴。

49.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780 上。

50. 杜預，《春秋釋例》，頁 373 上。

51. 杜預，《春秋釋例》，頁 267 上。

2. 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長曆》云：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3. 僖十二年，十二月，丁丑，《長曆》：十一月十二日，書於十二月，從赴。
4. 文十四年，五月，乙亥，《長曆》云：四月二十九日，書於五月，從赴。
5. 成四年，三月，壬申，《長曆》云：二月二十六日，書於三月，從赴。
6. 成九年，七月，丙子，《長曆》云：六月一日，書於七月，從赴。
7. 定四年，二月，癸巳，《長曆》：正月七日，書於二月，從赴。<sup>(註 52)</sup>

此七例，有五例見於《集解》，缺第三、第五例。僖公十二年經文「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杜《注》：「無傳。」未言從赴。成公四年經文「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杜《注》：「壬申，二月二十八日。」<sup>(註 53)</sup>亦不明言從赴。不過，從已知五例，不難推知《集解》與《長曆》在從赴的判斷上並無差異，《集解》中還有更多的從赴例證，可以補充。

所謂從赴（亦稱從告），指經傳記事以赴告為據；他國來告赴，國史據以書之；赴告的內容涉及崩薨禍福。如文公十四年《左傳》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即謂此。

從赴之說，並非獨見於《左傳》，《公羊傳》中也有從赴之義。<sup>(註 54)</sup>其他典籍，如《白虎通》論「天子崩，赴告諸侯」，及「臣死，亦赴告於君」，<sup>(註 55)</sup>與《左氏》說合。知赴告乃禮之常事。只是《左傳》的從赴說較《公羊》、《穀梁》更為豐富，且還有例則，如隱公七年傳云：「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至於杜預的從赴說，則是在傳例的基礎上，有更為詳細的說明。《長曆》云：

陳人再赴，兩書其日。齊緩告亂，書以十二月（案：十二月，疑是「九月」之訛）。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子駟實弑僖公，赴以瘡疾，而經從之。楚弑邾敖，齊弑陽生，皆其類也。君子不變

52. 分見杜預，《春秋釋例》，頁 274 上、276 上、291 下、304 下、313 下、315 上、358 上。

53. 據《長曆》，壬申乃二月二十六日。《集解》云「二十八日」（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01 上），此當是六、八形近而訛。

54. 如隱公元年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公羊傳》云：「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又如，《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云：「其言獲陳夏轂何？吳少進也。」何休《解詁》云：「名者，從赴辭也。」（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2327 下）是《公羊》家也有從赴之說。

55. 分見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下冊，頁 537、539。

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表之，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註56)

杜氏此處所論從赴，仍以崩薨為證，不過延及「日月闕否」上。疏通如下：

其一，「陳人再赴，兩書其日」，謂桓公五年經書「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此謂陳國動亂，陳侯卒，有兩次赴告魯國之事，前赴以甲戌日，後赴以己丑日。杜《注》：「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註57)杜氏之意，陳雖有兩赴，經但以後赴之月該前赴，故以此年「正月」兼含前年十二月。

其二，「齊緩告亂，書以十二月」，謂文公十四年經書「(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云「七月乙卯夜，齊商人殺舍而讓元。……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知齊商人弑君在七月，九月赴告於魯國，杜《注》云：「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註58)

其三，「天王偽赴，遂用其虛」，謂文公三年經書「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云「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杜《注》：「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于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註59)案：王子虎為周之卿大夫，王臣無外交，若無王命，不應有會盟之事。然僖公二十九年，經書王人（即王子虎）、晉人等會于翟泉，既是諸侯之會，則王子虎例當受天王之命，但經之「王人」已寓貶意，知王子虎假王命而會。由於天子之卿尊同諸侯，故天王籍「同盟」而赴告諸侯，經書「王子虎卒」，即據「諸侯薨赴以名」例，此乃「天王偽赴，遂用其虛」之義。在日期上，四月卒，赴則在五月。

此三例，杜氏特別提及「日月闕否」也屬從赴。至於其餘三例，與此稍異。「子駟實弑僖公，赴以瘡疾，而經從之」，謂襄公七年經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傳云：「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

56. 杜預，《春秋釋例》，頁45下。

57.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747中。

58.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854中。

59.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840上。

侯。」鄭僖公爲臣子所殺，經不書弑，傳則釋不書弑之由，杜《注》：「實爲子駒所弑，以瘡疾赴，故不書弑。」<sup>(註 60)</sup>「楚弑郟敖」，謂昭公元年經書「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傳云「縊而弑之」，但經不書弑，杜氏也以爲楚以瘡疾赴告。<sup>(註 61)</sup>「齊弑陽生」，謂哀公十年經書「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經亦不書弑，杜《注》：「以疾赴，故不書弑。」<sup>(註 62)</sup>此三例，杜氏解經文所以從赴之由，謂「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並有「示將來」之意。

雖然前後三例內容有異，但時間先後有共通之處，即從赴都是經後傳前。由於實際發生的日期在前（見傳文所載），赴告之期在後，故國史若據赴告之日記載，常落後於實期。如定四年經文「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據《長曆》，癸巳爲正月七日，經書二月，是實期在前，而經文所記在後。又如成公九年經書「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注》：「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也是實期在前，經文所記在後。同樣，文公十四年經「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同上例。

據此，上文七例的內容皆屬諸侯薨卒，時間均爲經後傳前，可以視爲春秋各國從赴禮的體現。杜氏的解釋，似乎可論證《長曆》的編排最合經傳曆日。

但是，問題也由此而生，因爲《集解》中包含更多從赴之例，這些例證，與上七例並不統一，甚至有自破其例者。如襄公十七年經文「(九月)宋華臣出奔陳」，杜《注》：「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sup>(註 63)</sup>案：華臣出奔，經、傳日期互異，經在九月，傳在冬，是經前傳後，即赴告之日反前於實期。今杜氏以「從告」爲說，與前所言經後傳前之例異，有自破其例之嫌。又如宣公十五年經文「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云：「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杜《注》：「書癸卯，從赴。」<sup>(註 64)</sup>案：據《長曆》宣十五年曆譜，六月乙酉朔，知癸卯爲六月十九日，辛亥則是二十七日。經以癸卯統攝敗、滅，杜氏以從赴爲釋，則經文所記在前（滅在癸卯），而實際之期在後

60.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38 上。

61.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2019 中。

62.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2165 中。

63.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963 下。

64.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88 上。



(滅在辛亥)。昭公十二年經書「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傳云：「楚殺其大夫成虎，……六月，葬鄭簡公。」成虎，即成熊，傳文所載鄭簡公葬在六月，經卻在五月，也是經前傳後，但杜《注》：「經從赴。」<sup>(註 65)</sup>實期皆在經文所記之後，均可謂自破其例。對此，後世學者已有譏評。<sup>(註 66)</sup>

不僅如此，杜氏從赴說還有與實情不合者。如僖公十五年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則云「(九月)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杜《注》：「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案：杜說非，此例經傳日期之異，並非從赴，乃建正之異，因春秋各國間的曆法並不相同。清代陳厚耀在編排《春秋長曆》時，特別提及各國間的建正差異，如謂「春秋時有用周正者，亦有用夏正者，其各國所書日月，不盡合於魯，故經傳多不合，月每差兩月，日每差一日」。<sup>(註 67)</sup>具體落實到晉、魯曆法之異，晉國曆法建首夏正，<sup>(註 68)</sup>而魯曆建首周正，故經、傳相差二月，或是建正不同的結果。對此例，閻若璩《潛邱劄記》云：

或問傳記「九月壬戌戰韓原」，經書「十一月壬戌，戰於韓」。杜氏以九月壬戌為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為月之十四日，事在前而書於後者，從赴也。經之從赴而書者眾矣，何獨此而疑其為夏正耶？餘曰：蓋從前後之文而決其為夏正也。……大抵《春秋》經文為聖人所筆削，純用周正，傳則旁采諸國之史而為之，故其間有雜以夏正而不能盡革者，讀者猶可以其意得之也。<sup>(註 69)</sup>

閻說以前後文為證，結論可從。相似之例如僖公九年《左傳》云：「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焉。」經以為十年正月里克弑卓，相差二月，亦屬建

65.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2061 中。

66. 如華臣出奔陳，元代趙沅《春秋左氏傳補注》：「經書華臣出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氏謂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為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趙沅，《春秋左氏傳補注》，《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 164 冊，頁 380 下。

67. 陳厚耀，《春秋長曆》，《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 178 冊，頁 537 下。

68. 關於晉用夏正，可參清代王韜撰，曾次亮點校，《春秋朔閏日至考》，收入《春秋曆學三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下〈春秋曆雜考·晉用夏正考〉，頁 102-104。

69. 閻若璩，《潛邱劄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 859 冊，頁 405 上-下。

正之異。故杜氏以從赴爲說，非也。

這種情形使得後世學者不僅懷疑杜氏對個別事例及曆日的從赴之釋，甚者更直接懷疑從赴說本身。宋代劉敞提到，從赴說只是基於「魯史」的立場，無視孔子作《春秋》的深意，不可信從。<sup>(註 70)</sup>有的學者雖認同從赴說，但對杜氏的理解頗有譏彈，如宋代葉夢得。<sup>(註 71)</sup>

既然從赴在時間上不具備經後傳前的統一之例，且杜氏對從赴的理解又不完全可信，則上七例的從赴之釋也就有可議之處。如第二例桓公十二年經書「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注》：「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正義》云：「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sup>(註 72)</sup>知孔穎達對杜氏之釋並不堅信。

由此觀之，杜氏爲彌縫《長曆》與經傳曆日的歧異，以從赴爲釋，其本意是彰顯《長曆》最合經傳曆日，曆譜可信；其結果，因從赴說互異，反而導致《長曆》可信度減弱。雖說與《乾度曆》及之前的曆譜相較，《長曆》即使失此七曆日，仍可謂最合經傳曆日，在杜預的心目中，並不認可曆譜有七例與經傳曆日不合者，故杜氏藉「從赴」釋之。

問題是，既然「從赴」作爲彌縫《長曆》與經傳曆日的解釋之法，爲何會出現前後違逆的現象？除了杜預的理解偏差外（如不明諸國建正之異），是否還有其

70. 如劉敞《春秋權衡》云：「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7冊，頁253下）在個別事例的從赴判斷上，劉敞均不同意杜氏之釋，如僖公十一年經文「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杜《注》：「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802中）案：據《左傳》，晉殺平鄭在僖十年冬，經書於十一年春，且傳文又有「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杜以從赴爲解，頗合經後傳前的先後之序，且內容亦關乎禍福之類。但《春秋權衡》駁云：「杜云『從赴』，非也。傳所據者，簡牘所記，以夏正記時，故使春冬錯。不自知，誤矣。乃復以爲晉晚來告。告雖晚，史所書自應正之，不容顛倒時月也。」劉敞，《春秋權衡》，《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7冊，頁208下。

71. 葉夢得《春秋考》云：「學者多罪《左氏》以經從赴告，而杜預解經有不通者，複多因其說委曲遷就，甚有疑經以爲誤者。夫以經從赴告，固非矣；若謂皆不從赴告，則經何由得其事乎？經者，約魯史而爲者也；史者，承赴告而書者也。諸國不赴告，則魯史不得書。魯史所不書，則《春秋》不得載。」葉夢得，《春秋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頁294上-下。但葉氏《春秋左傳識》又有非議杜說者，如隱公三年經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王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傳、注皆以從赴爲釋。然葉氏云：「傳每以經從赴爲說，杜預從而附會爲之義，甚有至於顛倒是非，反易名實者。害經之弊，莫大於此焉。」葉夢得，《春秋左傳識》，《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頁501下。

72.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1756上。

他原因？請看如下諸例：

1. 隱公三年傳曰：「王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此謂赴告之人改日，魯史因而書之。

2. 襄公廿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謂赴告不必以日，魯史因問而書之。

3. 文公十四年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案：商人弑舍在七月，今魯史書九月，是以赴告所在之月為準。

以上三例《左傳》所提供的赴告日期，並無定準。赴告之人既可告日，也可告月。而魯史所記，或據實期，或據告期；或記日，或記月。所以也無定準。這就是杜氏「從赴」說為何在時間上自破其例的根本原因。具體而言，杜氏的自破其例，是因為傳文關於從赴的論述前後不一。有時，以從赴解釋經傳日月之異，在時間上甚至會陷入解釋困境，如下例：

僖公九年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甲子，晉侯嵬諸卒。」杜《注》：「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sup>(註 73)</sup>

案：據《長曆》，僖公九年九月甲寅朔，甲子為九月十一日，戊辰為十五日，按照經傳依時間先後之例，當為「九月甲子，晉侯嵬諸卒。戊辰，諸侯盟於葵丘。」今經文卒在盟後，杜預以「從赴」釋之。可是，此處的從赴內涵卻極其含混。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赴以甲子日，至於何月則不得而知。孔穎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sup>(註 74)</sup>孔言「赴以日不以月」，是；但謂「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卻理據不足。既不知甲子在何月，無論魯史是否以赴告所在月為準，只要繫於九月，就應當以時間先後為序，何必定在「戊辰」之後？此例其實可歸為經文曆日互錯之類。杜氏以從赴為釋，反生歧義。

這種情形表明，儘管上述經傳七曆日中有共通點，赴告內容俱為諸侯薨卒，時間皆是經後傳前，以從赴為釋，可謂有據；但杜氏卻不可僅依此起例，因為《左傳》中的其他例證表明從赴在時間上並不統一，而杜氏的從赴說是建立在傳文的

73.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00 上。

74.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00 上-中。

基礎上。在注不違傳的大前提下，此種時間上的不一致，一方面說明從赴中的「日月闕否」並無定例，另方面也表明，以「從赴」彌縫曆日不合的可信度將被同類的反例所消解。

至此可見，杜氏的從赴說和曆日考證相關聯。如果說瞭解杜氏考證曆日的過程與特點，對於準確把握杜氏注釋經傳的涵義有所啓發（如上文辨析諸家不合《長曆》之旨），則反之亦然，瞭解杜氏從赴說的立論來源及不同類型，對於杜氏彌縫《長曆》與經傳曆日不合的用心也將有所領會。杜氏用心的表層涵義，無疑是說明《長曆》合乎經傳曆日。而杜氏用心的另層涵義，似乎暗含《左傳》優於二傳的認識。

比如上文提及的緩告三月之例，文公十四年經書「（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公》、《穀》二傳皆以爲舍乃未踰年即位，不應稱君，今經書「君」，是重商人弑君之惡。而杜預以爲魯史據從赴而書，即「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也。

（註 75）

所謂「明經日月皆從赴」，杜氏實別有所指。孔《疏》云：「明經之日月皆從赴而書，非褒貶詳略也。杜言此者，排先儒言日月有褒貶之義。」<sup>（註 76）</sup>此處的「先儒」，顯指《穀梁》。傳曰：「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案：《穀梁》之例，弑君例日，<sup>（註 77）</sup>此不日，是舍未成爲君。然此說與杜氏所論恰恰相反，杜氏一方面認爲「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sup>（註 78）</sup>另一方面也認爲，經文中的月日，並非如《公》、《穀》所言包含褒貶之義。從注經的體例看，「明經日月皆從赴」應屬贅辭，因爲杜氏解釋的重點是經傳七月、九月之異（即緩告三月），既屬從赴，則緩書之由已解，不必再添「明經日月皆從赴」。今杜氏加上此語，表明其他經傳曆日的互異也同樣屬於從赴之例，並非如《公》、《穀》所言有褒貶深意。所以，杜氏的解釋中暗含著如下觀念：《公》、《穀》二傳以日月時起例而成褒貶之義，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國史從赴之法。這就是杜氏用「從赴」彌縫經傳曆日互異時的另層涵義。

75.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54 中。

76.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54 中。

77. 廖平，《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 133 冊），頁 152 上。

78. 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頁 1853 中。

以上所述可證，無論杜氏從赴說是否合理，欲準確理解杜氏的經傳注釋，不能忽略杜氏的曆譜編排；同樣，要掌握《長曆》編排的更深內涵，則不能忽略經傳注釋。二者結合，將有助於深入理解杜預《左氏》學。

## 七、結語

總之，杜氏編排《長曆》，其目標不是爲了合天，而是爲了合乎經傳。杜氏知曉據曆算編排的曆譜，與經、傳曆日相較，誤差甚大。故採用另種方式，即根據經傳曆日而定晦朔，並參考四分術作相應調整，因而《長曆》的誤差範圍遠小於其他曆譜。當然，因爲誤差之小，也顯現杜氏的某些預設，比如，爲了符合經、傳曆日而編排曆譜，杜氏必然預設經、傳同曆。爲了彌縫曆譜與經傳曆日的矛盾，必然忽略春秋各國間的曆法差異，如晉曆建正與魯曆建正之異。換言之，即預設各國曆法無異。這些「預設」，正是理解杜氏《左氏》學的有效線索。從曆學的角度看，杜氏預設中的錯誤觀念，也是後世天文史家在編排曆譜時所要摒棄的，如新城新藏特別提及杜氏經、傳同曆的謬誤，<sup>(註 79)</sup>王韜也著重指出晉曆與魯曆的差異。與杜氏不同，編排出合天的曆譜，並用以校正《春秋》經傳中的曆日，是後世天文史家孜孜追求的目標。然而，從經學史的角度看，錯誤的曆譜仍是經學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對象——此曆譜的「錯誤」是如何產生的，又如何與經傳注釋相聯？諸如此類。正因爲經學史強調事例產生的過程及其成因，《長曆》即使在某方面正確，也必須置於經學的背景中以顯示其意義。如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長曆》以爲八月無丁巳，丁巳當爲七月朔，而張培瑜〈《春秋》日食表〉也認爲七月丁巳日食，<sup>(註 80)</sup>顯然，張氏係據現代天文學所推，而杜氏僅據傳意推測，二者的依據完全不同。明乎此，《長曆》無論正確抑或錯誤，都是經學史研究應該關注的：曆譜的編排如何與經傳注釋相印證？二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這些問題，較諸單一的經學或曆學論，無疑可以拓寬杜氏《左氏》學的研究視野。

79. 新城氏論云：「僅因其信《左傳》與經爲同程度可據之古籍，以經、傳所載之日月併成一團，而爲其研究資料，故其踏襲《左傳》中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七年之錯誤者，亦不足怪也。」新城新藏撰，沈璿譯，《東洋天文學史研究》，頁 320-321。

80.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頁 246。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 王韜撰，曾次亮點校，《春秋曆學三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
- \* 江 永，《群經補義》，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第194冊。
- \* 杜 預，《春秋釋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6冊。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 \* 陳厚耀，《春秋長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78冊。  
葉夢得，《春秋考》，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  
——，《春秋左傳識》，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  
廖 平，《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5，《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33冊。  
趙 汭，《春秋左氏傳補注》，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64冊。  
閻若璩，《潛邱劄記》，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859冊。  
劉 敞，《春秋權衡》，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7冊。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74冊。
- \*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986，《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149冊。

### 二、近人論著

- \* 邵積意，〈釋《漢書·五行志》中的《左氏》日食說〉，《中國史研究》，2，北京：2009，頁25-40。
- \*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濟南：齊魯書社，1987。
- \* 新城新藏撰，沈璿譯，《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上海：中華學藝社，1933。
-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修訂版。
- \* 劉洪濤，《古代曆法計算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Houyao. *Chunqiu changli (Long Calendar of Chunqiu)*, 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 Jingbu • Chunqiulei (Wenyuang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 Chapter Jing • Category Chunqi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1986, Volume 178.
- Du, Yu. *Chunqiu shili (The explanatory examples of Chunqiu)*, 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 Jingbu • Chunqiulei (Wenyuang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 Chapter Jing • Category Chunqi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1986, Volume 146.
- Gao, Jiyi. “Shi Hanshu • Wuxingzhi zhongde Zuoshi rishishuo (Explanations on Solar eclipse of Zuoshi in Hanshu • Wuxingzhi),” *Zhongguoshi Yanjiu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 2009, pp. 25–40.
- Gu, Donggao. *Chunqiu dashibiao (Events Chronology of Chunqiu)*, 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 Jingbu • Chunqiulei (Wenyuang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 Chapter Jing • Category Chunqi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1986, Volume 149.
- Jiang, Yong. *Qunjing buyi (Supplementary Meanings of Group Confucian Classics)*, 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 Jingbu • Wujingzongyilei (Wenyuang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 Chapter Jing • Category Wujingzongy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1986, Volume 194.
- Liu, Hongtao. *Gudai lifa jisuanfa (Calculation Methods of Ancient Calendar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injo, Shinzo. *Dongyang tianwenxueshi yanjiu (Studies on Astronomy Histories of Chinese)*. trans. Shen, Xuan. Shanghai: Zhonghua xueyishe, 1933.
- Wang, Tao. *Chunqiu lixue sanshu (Three Books of Chunqiu and Calendar Studies)*. Checked and Punctuated by Zeng, Cili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Yang, Bojun. *Chunqiu zuozhuanzhu (Annotations of Chunqiu Zuoz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 Zhang, Peiyu. *Zhongguo xianqin shilibiao (History Ephemeris of Pre-qin Dynasty)*. Jinan: Qilu Press, 1987.

## Duyu's *Changli* and Hi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ates in *Chunqiu* and *Zuozhuan*

Ji-yi G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 ABSTRACT

*Changli* (長曆) was arranged by Duyu according to the dates in the *Chunqiu* and *Zuozhuan*.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was following these works' months, days, and solar eclipse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ates of the new moon. Compared with the many calendars before Duyu's, *Changli* missed only thirty-three dates and four solar eclipse days and was mos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ates of *Chunqiu* and *Zuozhuan*. However, besides leaving out these thirty-three dates, *Changli* missed seven dates, which Duyu explained by *congfu* (從赴) (historians' recording of royal obituary notices). As his explanations for *congfu* were contradictory, we do not need to take at face value his argument regarding the missing seven dates. Through Duyu's explanations for *congfu* and intercalation, we know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Changli* was affected not only by his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dates, but also by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Comparing the classics and the calendar to each other should help us fully understand Duyu's studies of *Zuozhuan*.

**Key words:** Duyu, *Changli*, *Zuozhuanjijie*, textual research of dates in *Chunqiu* and *Zuozhuan*

(收稿日期：2009.2.17；修正稿日期：2009.4.20；通過刊登日期：2009.4.23)